



长江三峡工程
文物保护项目
报告

甲种第六号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9卷

重庆市文物局 重庆市移民局 编

新华书店



长江三峡工程
文物保护项目 报告

甲种第六号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1999卷

重庆市文物局 重庆市移民局 编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收录三峡工程重庆库区 1999 年度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27 篇。长江三峡地区不仅山水雄奇，而且是一座瑰丽的文化宝库。考古发掘表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华民族长江文明的重要舞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保存着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经历夏商周直到宋元明清的各代文物古迹。

本书作为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第三部科学发掘的正式报告集，相信对于三峡地区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可供历史研究、文物考古工作者以及文物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 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甲种第六号)

ISBN 7-03-016871-2

I. 重… II. ①重… ②重… III. 考古发掘 - 发掘报告 - 重庆市 - 1999
IV. K872.7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9616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同向东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安春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A4 (880×1230)

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1.5 插页：17

印数：1—1 500 字数：1 530 000

定价：3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

重庆库区编委会

主任 甘宇平

副主任 余远牧

编 委 甘宇平 余远牧 叶贵本 王耘农 王洪华
刘福银 陈联德 王川平 刘豫川

重庆市政府三峡文物保护专家顾问组

俞伟超 谢辰生 吕济民 黄景略 罗哲文 黄克忠

苏东海 徐光冀 徐文彬 夏正楷 庄孔韶

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

编 委 会

主 编 王川平

副主编 刘豫川 王仁湘 邵卫东 邹后曦

编 委 王川平 刘豫川 王仁湘 邵卫东
邹后曦 闫向东

编 务 杨小刚 范晓岚

重庆库区 1999 年度考古综述

王川平 邹后曦 白九江

1999 年度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地下文物的保护继续向纵深推进。按照三峡建委移民局下达的重庆库区文物保护计划，本年度共涉及 7 个区县的地下文物考古发掘项目 37 项，参与发掘的考古科研单位有 24 家，总计勘探面积 82530 平方米，发掘面积 29405 平方米。这是重庆库区 1997 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工作始于 1999 年 9 月，至 2000 年 6 月各项目均全面完成了田野阶段工作。本报告集收录了其中 28 个项目的 27 篇发掘报告和简报（杜家包和梁家包合并为一篇简报），其他项目的发掘报告（简报）由于种种原因暂未收录，待以后补缺。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通过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本报告集出版之前，我们欣喜地看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成开馆。作为展示重庆和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重庆库区近年来发掘出土的许多重要文物都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得以展示。我们还注意到，部分重要展览充分应用了三峡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重要成果，这说明了三峡文物保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三峡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1999 年度重庆库区各项目考古工作同样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新收获。本文主要根据收入本报告集的发掘报告介绍年度工作与收获，本次未刊布资料的一些重要发现，暂不涉及。

一

本年度共发掘了三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均属于旷野类遗址。其中冉家路口遗址和井水湾遗址的标本埋藏过程大体上未经分选，基本上属于原地埋藏。文化遗物均出露在长江古河漫滩和古河床边缘，埋藏环境比较复杂，值得深入研究。两遗址的石制品组合，既有华南原始石工业特征，也有华北原始石工业特征，体现了三峡地区旧石器文化在南北区域交流和影响中的重要作用。

冉家路口遗址是目前重庆库区发掘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它位于丰都县镇江镇长江左岸的第四级阶地，在 7 米厚的粉砂土和多层钙质结核层下，发现了 149 件石制品和一些哺乳动物骨骼化石。石制品中，石片和石核占多数，粗制品和精制品所占的相对数量也比较大。一般以自然台面对石核进行剥片，二次加工的技术水平较高，尤为突出的是精制品加工形制规整。器类多为砍砸器，有少量刮削器和尖状器。冉家路口遗址地貌部位清楚，层位明确，分布面积大，文化层厚，是华南地区露天旧石器考古遗址保存十分良好的一处遗址，对探索华南地区早期人类的行为模式相当重要。报告据地貌和地层判断，该遗址与高家镇遗址的时代大致相当，应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向中期过渡阶段或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初。

丰都井水湾遗址年代稍晚于冉家路口遗址，地质时代大致在晚更新世早段。该遗址是继 1998 年以来的第二次发掘。它位于长江右岸的第三级阶地，与冉家路口遗址隔江相望，其堆积物主要由粉砂质细砂组成，厚约 22 米，在遗物分布密集区清理了 3 个发掘层，出土标本 1500 多件，其中石制品 300 多件，还有 10 多件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多由砾石锤击、碰砧法加工而成。石制品的形态以宽薄型为主，石核打片的利用率较高。粗制品和精制品比例较大，器类以砍砸器为主，另有少量刮削器等；其加工方法既有单面加工，也有两面加工。考古年代大致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报告注意

到井水湾遗址出土的石核相对数量较少，而石片较多，精制品和粗制品的原型多为石片。上述状况与相隔不远、年代接近的高家镇遗址存在明显的差别，报告认为很可能是遗址性质不同产生的结果，同时指出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组合是一个受多因素制约的变体模型，这个模型应当包括地质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局限与影响。这一认识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传统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

忠县唐家河旧石器地点位于长江右岸支流易家河口附近的第二级阶地上，在遗址的原生黄褐色黏质粉砂层中，发现了少量石制品、石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动物肢骨化石。该石器地点出土的文化遗物较少，可能是当时远古人类的临时活动场所。虽然石制品的类型和制作信息有限，但仍可以看出其性质与长江三峡第二级阶地其他古文化遗存的一致性，其时代可能属于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对于探索三峡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具有一定的意义。

1997年以来，重庆库区陆续发掘了一系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了重要收获。这些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些空白，而且对于研究旧石器遗址的分布规律和更新世地质地貌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发掘整理工作中，重庆库区旧石器考古既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又注意吸收了一些国内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大面积发掘中率先应用发掘和观测规范，获得了较完整的、系统的考古记录资料，这对国内旧石器考古的发展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无疑，1999年度三峡地区新石器考古最为重要的收获当属哨棚嘴遗址的发掘。该遗址1999年度工作在1997年度基础上，又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弥补了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空白。需要强调的是，本次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的遗存是在原先普遍认为的“生土层”下，再下掘2米左右的河流淤沙层后发现的。这个发现，除三峡考古学原始文化认识的推进意义之外，对于如何甄别三峡地区的间歇层和真正意义上的生土层，掌握三峡地区古遗址的埋藏规律，进而从环境的角度了解古代的三峡，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99年度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报告分为3期7段。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遗存属于新发现。第三期遗存又分为早、中、晚3段，大体上和1997年度的第一期3段相对应。通过横向对比和研究，报告推断第一期遗存的时代应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晚期；第二期遗存时代约与屈家岭文化相当；第三期遗存时代与石家河文化大体相当。哨棚嘴遗址的三期新石器文化内涵极其丰富，但年代跨度较大，中间还应有一定的缺环。譬如第一期晚段罐类器多卷沿，不见折沿，器物腹部外鼓；而二期早段罐类器多折沿，少见卷沿，器物腹部略弧，显见两者间差异较大。有的期段（如第一期早段）材料还比较单薄，难以窥其全貌。第一期和第二期遗存的发现，将重庆新石器时代偏晚阶段的文化年代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使渝东峡江地区的文化编年有了较大突破。同时，哨棚嘴第三期晚段正可以与1998年度忠县中坝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遗存相衔接，由此可以建立重庆峡江地区从距今约6000年至夏代早期的土著新石器文化序列。

1999年度哨棚嘴遗址的突破性发现也引起了我们对文化分期和文化命名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重庆峡江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土著新石器文化逐渐显现，人们由此先后提出了“老关庙文化”、“魏家梁子文化”、“哨棚嘴文化”、“中坝文化”、“玉溪坪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工作，过去的一些零星材料现在基本上能够串联起来，并因此逐渐改变了此前的一些认识。魏家梁子遗址的陶器，包含了一定的石家河文化和白庙遗存的成份；老关庙遗址的陶器，为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三星堆文化之前的遗存，已在忠县中坝遗址的发掘中得到证实，不具

有代表性。1999 年度的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修正了以前有关“哨棚嘴文化”的概念，提出依照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的三期遗存，分别命名为“哨棚嘴一期文化”、“哨棚嘴二期文化”、“哨棚嘴三期文化”的建议，以此建立渝东峡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框架结构。我们认为，哨棚嘴遗址的三期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一脉相承，但差异还是明显的，这三期遗存分别属于三个文化阶段是有道理的。同时，虽然哨棚嘴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延续时间较长，但不是每一期在渝东峡江地区都具有代表性，且以各期遗存直接命名文化容易造成混淆，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

丰都玉溪坪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主体遗存主要相当于哨棚嘴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其遗迹和遗物都十分丰富，且发掘材料已在一些论文中部分披露。忠县中坝遗址则发掘了相当于哨棚嘴遗址第三期遗存和老关庙遗址的新石器遗存在内的遗物，是渝东峡江地区相当于石家河文化至白庙遗存阶段最有代表性的遗址。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调整上述文化命名，以便有一个统一的称呼指代不同阶段的新石器文化，避免造成混乱。即将与丰都玉溪坪遗存基本相同的哨棚嘴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归并，命名为“玉溪坪文化”。哨棚嘴遗址第三期与忠县中坝、奉节老关庙遗址性质相同、年代互相衔接，与玉溪坪文化内涵相较，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应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命名为哨棚嘴文化或“中坝文化”。玉溪坪文化和哨棚嘴文化（中坝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属于独立于周边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峡江文化系统。

本年度万州苏和坪、黄柏溪、涪溪口、麻柳沱等遗址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存。苏和坪遗址下层陶器多见细绳纹，器类有折沿罐、卷沿鼓腹罐、卷沿盆、内折沿钵、敛口钵等，其中的内折沿钵、敛口钵等陶器，与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二期遗存相近，应属于玉溪坪文化。出土的圈足杯则与屈家岭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反映了二者之间的联系。麻柳沱遗址继 1998 年度发掘后，本次发掘首次区分出了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出土遗物很少，但罐类器卷沿、施斜向附加泥条的特征，还是显示出了较早阶段的特征。涪溪口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虽混杂了一些商周陶器，但充实了有关该遗址的新石器文化内涵。黄柏溪遗址的早期第一阶段遗存以折沿、卷沿罐形器占多数，也有一定数量的喇叭口器，其器物口沿盛行加厚、粗花边的作风，其时代比较晚，应属于哨棚嘴文化（中坝文化）偏晚阶段的遗存。涪陵蔺市遗址、万州中坝子遗址亦出土有新石器时代陶器，虽然没有发现这一阶段的文化层和遗迹，但作为一个点上的信息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溪文化不同于瞿塘峡以西的土著新石器文化。在以前的历次调查发掘中，除大溪遗址外，巫山境内还有一系列大溪文化遗址。本年度发掘的培石遗址即发现有这一遗存。培石遗址位于巫峡内渝鄂交界附近，属于陡坡山地。出土的新石器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中红陶为大宗，器表施红陶衣，陶器多素面，有少量细绳纹陶器和彩陶器。器类主要有碗、钵、盆和罐，文化面貌与宜昌中堡岛、巫山大溪遗址的大溪文化接近。该遗址的发掘对认识大溪文化在渝东地区的分布有一定意义。

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房屋有地平式和干栏式两种。哨棚嘴遗址第一期晚段发现有房基的一角，地面残存红烧土硬面或白灰面，推测其形状呈长方形，建房前曾开挖了箕状基槽以平整土地；房屋有 4 层近水平的层状垫土。该房基应为地平式房屋。黄柏溪遗址发现的以柱洞和沟槽构成的残房址可能是干栏式房屋。苏和坪遗址发现了大量竹骨泥墙残块，竹节痕迹明显，两面敷泥，转角方正。上述房址的发现丰富了渝东峡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内涵，对于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万州大周溪遗址 II 区发现了 8 处新石器时代石器作坊，其中 1 号作坊面积巨大，约有 100 平方米。在作坊地面上，共发现 134 件相关遗物，作坊的中心位置还发现有红烧土痕迹，估计与石器加工活动有关。作坊内普遍发现有石料、半成品、石器，以及磨石等加工工具。1 号作坊出土陶器有折沿罐、敛口钵、内折沿钵、纺轮等，具有玉溪坪文化特征。考虑到石器工业在峡江地区新石器时

代具有的重要地位，大周溪遗址首次发现的石器作坊无疑意义重大，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石器加工流程、加工方法及石器工业的其他相关问题。

三

夏商至西周时期，渝东峡江地区的考古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文化面貌与时代分别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西周中、晚期的考古遗存，本年度也继续有所发现。

从近年来三峡地区的考古成果看，三峡地区的夏商西周时期考古遗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遗址数量少；二是文化层普遍较单薄，遗迹和遗物均较贫乏；三是峡江西部地区的发现，呈现强烈的三星堆—十二桥文化面貌，而越往东文化因素越复杂。这些发现，对于早期巴文化的认识，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阶段的遗存发现较多，显示这一时期三峡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文化日趋繁荣。

本年度发现的夏商时期三星堆文化相似遗存有涪陵蔺市遗址乙组陶器、忠县哨棚嘴遗址第四期、巫山培石遗址的夏商遗存等。蔺市遗址虽然多为次生堆积，但其出土的三星堆文化遗物异常丰富，引人注目。典型器类有圆肩小平底罐、封口盆、簋形器、竹节形高柄豆、灯形器、圈足器盖等，从各器物特征看，应属于三星堆文化偏早阶段。联系到与蔺市遗址相隔不远的镇安遗址，在规划阶段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三星堆文化陶器，涪陵地区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哨棚嘴遗址第四期陶器大多数为素面，有少量拍印绳纹。器类有小口中领瓮、耸肩小平底罐、子母口尖底盏等。由于已经出现了尖底盏，耸肩小平底罐也具有三星堆文化最晚阶段的形态，所以本年度发掘的哨棚嘴遗址第四期应属于三星堆文化晚期，具有向十二桥文化转变的特征。巫山培石遗址的夏商时期遗存陶器多有绳纹，此外还有一些斜划纹、弦纹等。可辨器类有各种圆肩罐、敛口钵、盆、灯形器等，显然，这类遗存与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既有相同的文化因素，也有许多相异的特征，更多地表现出本地区文化的风格。

丰都石地坝遗址的商周遗存，是本年度的重要发现之一。在1000余平方米发掘范围内，普遍发现了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清理出大量灰坑。该遗址第一期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素面绳纹罐、侈口罐、翻沿罐、尖底盏、角状尖底杯、炮弹形尖底杯、船形杯、高领壶、卷沿盆、缸等，器类十分丰富。报告认为，石地坝第一期遗存与十二桥文化都流行尖底盏、尖底杯等为主的尖底器，应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但第一期遗存与十二桥文化又存在较大区别，如船形杯为夹粗砂红陶，厚胎薄唇圈底，为峡江地区首见；素面绳纹罐所占比例较大，卷沿浅腹盆、侈口束颈球腹釜、敛口小底钵等不见于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说明其在文化内涵上具有相当突出的地域特征。

对于渝东峡江地区商末周初的考古学文化，已有学者注意到它与典型十二桥文化的差异，曾称其为十二桥文化“川东类型”。我们认为，由于行政区划的变革，再考虑到以大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不符合考古规范，故十二桥文化川东类型的称呼应予摈弃。石地坝遗址第一期遗存遗迹丰富，器类多样，器物的型式演变清楚，十分典型，在渝东峡江地区具有代表性，可以将这类遗存称呼为“石地坝遗存”。从整个三峡地区看，石地坝遗存偏早阶段与成都平原相同的文化因素较多，偏晚阶段两者的差异逐渐加大。此外，联系鄂西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一些因素（如尖底器）发源于峡江，因此，十二桥文化的发源很可能在渝东或鄂西地区。

本年度的发现中，属于石地坝遗存的还有涪陵镇安遗址早期、忠县哨棚嘴遗址第五期等。这些

发现丰富了石地坝遗存的文化内涵，对石地坝遗存的分期研究也提供了重要资料。

重庆峡江地区紧接石地坝遗存之后的西周时期考古遗存以 1998 年度瓦渣地遗址为代表，曾有建议命名为“瓦渣地文化”。“瓦渣地文化”年代介于十二桥文化石地坝类型和东周考古遗存之间，既保留有较多尖底器、素缘圜底器等石地坝类型的特征，又大量出现了具有东周遗存风格的花边圜底罐等陶器，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此外，从这一阶段至春秋时期，重庆峡江地区与成都平原的考古文化差异明显，分化趋势加大，应当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

1999 年度相当于“瓦渣地文化”阶段的遗存资料发表较少，其中比较重要的仍属巫山双堰塘的西周遗存。该遗址已经过两次发掘，但出土物较破碎，本次发掘复原了一批陶器，无疑为深入研究双堰塘遗址西周时期遗存的定性、分组、分期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应当说，双堰塘遗址西周遗存与峡江西部地区的典型“瓦渣地文化”有一些区别，主要体现在出现了以鬲、黑皮陶高柄豆等为代表的一些陶器，在渝东峡江地区缺少这样的传统，它们的出现，不应当忽略来自东面的影响。1999 年度双堰塘遗址还发现了 3 处较大的红烧土堆积，其中两处可能是坍塌的房屋墙体碎块堆积，一处可能是房址的地面烧土面。另外还发现残陶窑一座，从窑内清理出大量的红烧土碎块、炭屑和陶片。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四件有占卜痕迹的卜甲，均有凿无灼，其方形凿与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的卜骨相似，体现了较强的地方特色。这一发现对认识商周时期峡江地区的占卜习俗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四

本年度东周时期的考古材料可分为居址和墓葬两大类。其中居址材料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有石地坝遗址第二期和哨棚嘴遗址第六期，推测年代大体在春秋早、中期。石地坝遗址第二期遗存，器类比较单调，主要是大花边口圜底罐，该遗址第一期也有少量花边口罐，两者相比，前者的花边较粗犷，绳纹粗大，后者花边较小，绳纹略细。哨棚嘴遗址第六期以夹砂陶为主，器物多施中、粗绳纹，出土有束颈卷沿花边圜底罐、卷沿鼓腹罐、矮圈足杯、敛口钵等陶器，充实了该遗址东周遗存的文化内涵。

第二阶段遗存以本年度万州麻柳沱遗址 I 区东周遗存为代表，年代估计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该遗址清理了大量灰坑和 2 座陶灶。I 区出土陶器绝大多数是夹砂陶，绳纹在纹饰中所占比例非常高，器类有陶束颈花边口圜底罐、直口花边圜底罐、素缘圜底罐、圜底钵、浅腹尖底盏、中柄豆、甗等，以前三类陶器数量最大，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陶器的形态特征看，比 1997 年度中坝遗址发掘的东周遗存略早。该遗址还发现有铜钺、刀削以及铜镞、鱼钩等小件铜器，这类铜器大多数发现于 II 区，或许与 I 区的遗存有时间上的差异。为数不少的东周石范堪称一项新收获，石范经久耐用，主要用来制作造型简单的铜器。麻柳沱遗址、新浦遗址以及石地坝遗址发现的石范表明，峡江地区的小型铜器很可能都是各区域自行铸造的，铸铜工业规模小而分散，并抑制了峡江地区青铜器铸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麻柳沱遗址与 1998 年度一样发现了较多东周时期的卜骨，钻、凿、灼、兆都有一定的自身特点。材料除龟甲外，也有用鱼腮骨的，这和清江香炉石遗址发现的商周卜骨颇相似，体现了巴文化原始宗教文化发展的延续特征。

第三阶段主要指战国中、晚期的考古遗存，本年度发现极少，材料比较零星，此不赘述。

巫山地区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与峡江西部地区完全不同，呈现出强烈的楚文化特色。大宁河流域内的蓝家寨遗址属于第二次发掘，出土的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与第一次发掘基本一致。出土陶器有鬲、盆、罐、豆、长颈壶等，均为日用陶器，与楚国核心地区的同类器相似，可以划分为两期，第

一期约在春秋中期偏晚，第二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以前。该遗址的楚文化因素占绝对主导地位，仅有极少量巴文化因素，说明楚文化的势力已完全控制这一地区。蓝家寨遗址本年度还出土一大批铁农具，这是重庆峡江地区出土最早的铁器之一，显示了在楚文化的影响下，峡江农业生产已有较大发展和进步。另外，该遗址还发现了3座房址，其中F5呈长方型，为地平式房屋，房内发现9个柱洞。2座陶窑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但其结构有一定的差异。Y1规模较小，平面呈葫芦形，窑室和火道保存较好；Y2由火膛、窑室和后部的单烟道三个部分构成，属于半倒焰式陶窑。两窑之间堆积大量备用陶土，周围遍布大型灰坑和灰沟，报告推测这里曾是制陶区，由此可以说明蓝家寨遗址的东周楚文化陶器属于本地烧造。蓝家寨遗址房址、陶窑的发现为聚落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

巫山境内本年度发掘的其他东周遗存还有培石遗址，其出土物系比较单纯的楚文化陶器，是楚文化在巫峡内的一个重要据点。

奉节新浦遗址已经过多次发掘。其上层遗存包含巴文化和楚文化两种文化因素的陶器，说明楚文化的影响已经到了奉节地区。

东周至西汉早期的墓葬材料主要有万州中坝子、大周溪和涪陵镇安等地点，均属于战国晚期及稍后的墓葬，对晚期巴文化的研究有较大价值。

中坝子遗址继1998年度发掘16座东周时期墓葬后，本次又发掘3座东周时期土坑竖穴墓。其中34号墓带有二层台，系二次葬，有棺木痕，是目前为止中坝子遗址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共出土39件随葬品，其中陶矮圈足豆就有29件。该墓出土陶器有凹底罐、平底罐、矮圈足豆；铜器有矛、镦；玉器有璜、料管等。矮圈足豆敛口，腹部较深，口径与器高之比较小，应属于战国晚期早段。此外，还出土有3座秦代到汉代早期的墓葬，均带有二层台。出土遗物极少。

万州大周溪遗址首次发掘战国墓葬1座，土坑竖穴，葬具系单棺单椁。出土了高领罐、孟、矮柄豆等陶器。时代应属战国晚期偏晚。

万州大地嘴墓群发掘了两座西汉早期墓葬，其中一座带有二层台。随葬品放置集中，均位于头部与墓壁间。M27出土四件矮柄豆和一枚四铢“半两”；M26则出土有折肩圜底罐、圜底釜、甑等陶器，以及“半两”和一些铁器。

涪陵镇安遗址本次再次发现13座墓葬，均长方形竖穴土坑，只有一座墓带刀把形墓道。墓圹多数向东北，方向较为一致。随葬品多为陶器，部分墓葬随葬有铜器、铁器或半两钱币。陶器种类有罐、釜、孟、豆、瓮、壶、甑、碗、钵等，铜器有鍪、戈、矛、铖、剑等。依据出土半两钱币和器物形制的演变及型式的组合，报告将这批墓葬分为五期6段，年代范围从秦灭巴蜀前后至西汉早期，与1998年度相比，秦代以前的墓葬属于新发现。该墓地的出土器物，绝大多数属于巴文化。本次出土的四枚铜质和一枚角质印章，也是很重大的发现。此外，这批墓葬还有一些秦、楚文化因素，秦式器物如铜蒜头壶、圆肩瓮等，楚式器物如矮领圆肩罐等，它们对于研究巴、楚、秦的关系和巴文化的消融提供了新材料。镇安遗址的东周秦汉墓葬集中分布于遗址北部的高处平台内，结合上一年度清理的10余座墓葬看，主要是东西成排的两排墓葬，布局比较规整，对墓地结构和性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

从西汉中期开始，重庆峡江地区的汉文化面貌基本确立。西汉中期至南朝时期的居址和墓葬多有发现。

巫山张家湾遗址本年度发掘了西汉时期陶窑3座，其中Y3保存较好，平面形状呈马蹄形，由窑

室、火膛、烟道和窑门四部分组成。东汉祭祀坑发现 1 个，坑内上层均匀地铺有一层河卵石，坑底有猪下颌骨、肢骨等，推测可能具有奠基或祭祀性质。东汉时期的 3 座房址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均为地面建筑。皆以大型卵石堆砌墙基，人工铺垫居住面。其中 F4 可能是分间的排房，长约 22.5、残宽 3.5 米。房址周围发现有筒瓦、板瓦、瓦当、残砖等建筑材料。张家湾遗址两次发掘，都发现了房屋和窑址，表明这一带可能是制陶作坊区与生活区。同时，该遗址还出土了较多箭镞，大多为铁铤铜镞，有的还有使用过的痕迹，表明当时张家湾遗址具有浓厚的军事防卫性质。张家湾遗址地处大宁河内的大昌盆地，隔江与双堰塘遗址相望，后者在历年发掘中也发现了汉代遗存，这说明汉代时，张家湾、双堰塘遗址等处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聚落群。张家湾等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大昌盆地古聚落的分布、各聚落的功能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

汉代的墓葬材料较多，双堰塘、小云盘、大周溪、大地嘴、杜家包等地点都有发现。

双堰塘遗址本次发掘的汉代墓葬区与 1998 年发掘的汉代墓葬在同一地点，位于双堰塘遗址南区大宁河河床的东部河滩上，河滩经多年的洪水冲击，发掘前发掘点已堆积出较厚的砾石层。本年度发掘清理出汉代墓葬 6 座，其中砖室墓 2 座、石室墓 3 座和土坑墓 1 座。该墓地墓葬分布错落有致，未出现打破或叠压关系，绝大多数墓葬的墓向都是坐北朝南，说明可能有了一定的规划。

奉节小云盘遗址本年度系第一次发掘，共发现 5 座汉代墓葬，除一座墓葬外，余平面形状均呈长方形，土坑竖穴，带斜坡墓道，有的墓内发现有木椁痕迹，部分墓葬底部铺石板，墓内常见多具骨架。报告认为这批墓葬时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万州大地嘴墓群 1999 年度发掘了 13 座汉代墓葬，该墓地的东汉墓大多为横式长方形土坑墓，有的还有二层台；砖室墓发现 2 座。我们认为，土坑墓和砖室墓的差异主要是时代差异，土坑墓应多为东汉偏早阶段，砖室墓为东汉偏晚阶段。墓内随葬人骨一般有多具，体现了汉代家族墓地的传统。大多数墓葬随葬品比较丰富，但以生活用器为主，陶俑和模型明器较少。

万州大周溪遗址 I 区发现 5 座东汉墓。除一座为石室墓外，余全为砖室墓。M6 以全牛随葬，实属罕见，为了解三峡地区汉代丧葬习俗提供了新材料。

丰都杜家包汉墓群，共清理汉代墓葬 19 座，其中竖穴土坑墓 2 座，砖室墓 17 座。所有墓葬均分布在 5 个相对独立的小山包上。砖室墓随葬器物组合以陶质生活用具、大量陶俑和模型明器为主，有铜钱铺地的习俗。

从近年来重庆库区发现的汉代墓葬看，峡江东岸和西部地区似乎有一定的差异。譬如墓葬类型方面，东部的巫山地区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无券的砖（石）室墓、岩洞墓等，而西部地区则缺少这类墓葬，表明汉代以来的许多埋葬方式东部得风气之先，西部很可能更多地受东部的影响。又如东部地区多石室墓，西部地区多砖室墓；在墓地的选择上，西部地区多位于小山包或土包上，而东部地区多选择坡地。对峡江地区墓葬的差异研究，还应放在峡江地区的对外交通以及整个区域在全国的位置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峡江地区汉墓的分区及其背后的原因。

本年度六朝时期的考古材料比较少。万州王家湾遗址发现的 7 座六朝时期的房址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该遗址的 7 座房屋均属木骨泥墙建筑，保存较好，有的还保存有一定高度的墙体。以 F5 为例，该房址为一东西相连的三开间房址，整个房址平面呈长方形，中间有两道短墙，将房址分隔为三间。在房址的转角处，还发现有圆形的柱洞，内置扁平砾石作为柱础。有的房内居住面还发现有夯窝。王家湾遗址房址的发现，对研究峡江地区六朝时期民居建筑及聚落考古都有重要作用。

除万州大地嘴墓群的 7 座墓葬外，六朝时期的墓葬比较零星。

唐宋时期以丰都玉溪遗址的发掘材料较为丰富。该遗址本年度发现了唐代房址 3 座，唐宋时期墓葬 7 座。房址按墙体建造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只见柱洞，不见墙基；另一类有石墙基。本次发

掘的 F2-1 平面呈曲尺形，面向长江。该房屋以垫土找平，再于其上砌石墙基，墙体可能是木骨泥墙。房屋的前、后均有花纹砖或条石砌成的排水沟。该房址长约 14 米，宽约 10.5 米，体量宏大。玉溪遗址唐代房址附近发现有大量莲花纹瓦当、筒瓦等，房屋的立柱也比较大（如 F4 的柱洞直径达 40 厘米）。种种迹象表明，玉溪遗址发现的唐代房址规格较高，联系到与此相邻的玉溪坪遗址近年出土大量唐代佛教金铜造像，那么玉溪的唐代房址很可能与宗教建筑有关。

唐宋时期的墓葬材料发表的有巫山培石遗址、蓝家寨遗址、万州大地嘴遗址、丰都玉溪遗址等。本年度发掘的多数墓葬为土坑竖穴墓，缺少土洞墓的资料，另外还有少量砖室墓、石椁墓等。玉溪遗址发现的宋代石椁墓，以大石板砌成椁室，颇有特色，是三峡地区新发现的宋代墓葬类型。

六

本年度的发掘，在远古洪水、河道变迁、人地关系以及考古埋藏穴等领域也有不少新的收获。

忠县哨棚嘴遗址在以前所认为的生土层下面，又发现了新的文化层和多个间歇层。这除了提醒我们慎重对待“生土”外，也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古洪水资料，对研究长江上游洪水周期及洪水水位变化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在峡江地区像哨棚嘴这类临江遗址的埋藏状况还有很多，只是没有哨棚嘴遗址的河流相自然沉积层那么深厚，而且由于大洪水会对文化层进行侵蚀和搬运，在一般的遗址中缺少比较纯净的“间隔层”。显然，在以后的发掘中，加强各遗址对古洪水形成的地层的辨识，以及对洪水淤积层数量、时代、高程的记录，对长江古代水文以至人地关系的研究十分重要。

巫山张家湾遗址本年度发掘也发现了十分深厚的晚期自然沉积层。该遗址的自然沉积层位于现代耕土层下，汉、唐文化层之上。其自然沉积层的特点是受河流沉积与山坡侵蚀堆积的交替作用或共同作用。该遗址自然堆积层呈西厚东薄的分布态势，西部堆积厚达 2 米，可划分为十多个自然沉积层；东部的自然沉积层一般几十厘米至 1 米左右，自然沉积层多在 6 个以下。自然沉积层内的一些沉积物呈现出分选性好，沉积韵律明显的特点。报告推断这些自然沉积层应与地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有关。该遗址的自然沉积层为大宁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巫山双堰塘遗址和张家湾遗址隔大宁河相望，两遗址的发掘对于了解大宁河河道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活动范围的进退很有意义。双堰塘遗址 1998 和 1999 年度均发现了一些汉墓，这些汉墓位于大宁河的现代河滩上，河滩经多年洪水冲击，墓葬上面覆盖了较厚的河卵石。从墓葬的位置判断，在东汉时，墓葬所在地不应是大宁河河滩，说明经过近 2000 余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大宁河该段河道已向东摆动了不少。张家湾遗址的发掘也证实了这一判断。该遗址发现的西汉窑址原位于张家湾遗址的中央，到新莽至东汉时的窑场却向东北移动了数十米，由于窑场大多临河或靠近水源地，表明当时的河道已向东推移。

洪水、河道变迁等对古人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三峡地区的人们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在部分遗址中发现了可能是古人治水的遗迹。鱼复浦遗址发现宋代石坝墙 1 条，该墙底部用大石条筑底，其上用石块或石条垒砌。在石坝墙上发现有较多的水生动物壳，报告以此推测，石坝墙应是拦水用的。本年度双堰塘遗址北区探方中新发现了六个坑洞遗迹，与 1997 年度和 1998 年度发现的坑洞在平面上构成一个矩形，报告认为它们或许与当时的河边堤防建筑直接相关。

人与水的关系，还表现在人过度向水体索取资源上。万洲麻柳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各型网坠，这些网坠随时代的不同有一些变化。考古发现表明，东周时期的陶网坠普遍较小，至唐代时，陶网坠的直径已增大到一倍以上，到了明清时期，已大量使用形制和石料非常统一的石网坠。麻柳沱遗址发掘简报认为，单一网坠重量的递增，很可能意味着鱼类资源的递减。这其中包含的问题如技术

进步、工具更新、经济类型、人口增长、文化传统等，都颇为令人深思，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万州麻柳沱遗址在发掘过程中还对次生堆积残留消息的提取进行了尝试。该遗址位处长江干流西岸高约 10 余米的一级阶地上，经过几千年江水的侵蚀已面目全非，目前仅残存一片约 5000 平方米的南北狭长台地。遗址东面阶地断崖每年因洪水作用而不断被侵蚀、塌落而后退，麻柳沱早期堆积应当位于靠近江边的遗址东部，遗址的中心部分堆积现在基本上已荡然无存。在遗址东部断崖陡坎之下的河漫滩上的Ⅱ区，选择了一处因一级阶地塌垮而形成的次生堆积进行了尝试性的试掘。根据试掘结果推测，遗址北部并不是唐宋以前人群活动的中心地带。同时结合多种因素考量，可以推测东周时期曾有相当大的洪水侵淹过麻柳沱遗址。自然因素特别是水动力对遗址的破坏，看来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目 录

| | |
|------------------------|---------|
| 重庆库区 1999 年度考古综述 | (i) |
| 巫山蓝家寨遗址发掘报告 | (1) |
| 巫山张家湾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 | (26) |
| 巫山培石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 | (59) |
| 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 | (80) |
| 奉节鱼复浦遗址发掘报告 | (145) |
| 奉节小云盘遗址发掘报告 | (156) |
| 奉节新浦遗址发掘简报 | (168) |
| 奉节毛狗堆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 | (180) |
| 奉节王家包遗址发掘简报 | (189) |
| 奉节瞿塘关遗址发掘报告 | (202) |
| 万州中坝子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 (235) |
| 万州大周溪遗址发掘报告 | (253) |
| 万州大地嘴墓地发掘报告 | (328) |
| 万州黄柏溪遗址发掘报告 | (402) |
| 万州苏和坪遗址发掘报告 | (433) |
| 万州王家沱遗址发掘报告 | (451) |
| 万州涪溪口遗址第三期发掘报告 | (478) |
| 万州麻柳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 (498) |
| 忠县唐家河石器地点发掘报告 | (525) |

| | |
|-------------------|-------|
| 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 | (530) |
| 丰都井水湾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 (644) |
| 丰都玉溪遗址发掘简报 | (655) |
| 丰都杜家包汉墓群发掘简报 | (681) |
| 丰都石地坝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报告 | (702) |
| 丰都冉家路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 | (738) |
| 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 | (747) |
| 涪陵蔺市遗址发掘简报 | (786) |

巫山蓝家寨遗址发掘报告

重庆市文化局 重庆市博物馆

湖南省益阳市文物考古队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

遗址位于巫山县大昌镇大宁河左岸一级台地上，北临大昌古城，西距双堰塘遗址仅3公里。这里是著名的大昌盆地，周围群山环抱，中间地势平坦。

为做好重庆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1998年度曾对蓝家寨东周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资料。为进一步了解大昌盆地东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根据三峡文物保护规划，2000年4月2日至5月12日，湖南省益阳市文物考古队配合重庆市文物部门对该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图一）。先后开5米×5米探方41个，编号为T24~T64，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图二；彩版一）。主要探方位置系1998年度发掘区向东或向北的顺延。这次发掘取得较大的收获，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遗迹。

发掘领队盛定国。参加发掘的有盛定国、符伏田、舒华昌、曹伟、邓建强、丁国荣、吴宁平、舒文明、胡劲松等同志。巫山县文管所及大昌镇文化站曾派员协助工作。现将该遗址本年度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一、地层堆积与分期

遗址发掘区内各探方地层堆积基本相似，揭去表土层和扰乱层后即为东周地层。统一地层后划分为4层，加上2层下的遗迹，共分为5个层位。下面以T37东壁、T29东壁、T30北壁地层剖面为例介绍如下：

第1层：耕土层。厚20~30厘米。黑灰色土，土质疏松，间有现代砖头瓦片。

第2层：扰乱层。厚10~20厘米。棕黄色土，土质稍紧，出土青花瓷片及少量东周陶片。

2A层：厚10~30厘米。褐红色土，含沙，较纯净，分布在发掘区内靠陶窑的几个探方，含极少量东周碎陶片。

第3层：东周文化层。厚15~40厘米。灰褐色土，土质坚硬。陶片以泥质或夹砂红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有鬲、罐、盆、豆等。

3层以下即灰黄色生土（图三）。

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相互关系以及器物出土情况，可将这次发掘的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遗存分为早一期和早二期。即第3层的遗存为早一期；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2A层并打破3层和生土的东周遗迹为早二期。开口于2层下的M1、M2、M3定为晚期遗存。

二、早期文化遗存

（一）早一期文化遗存

1. 陶器

陶器有泥质陶、夹砂陶和夹炭陶，以泥质红陶占多数，占总数60%以上，其次为夹砂陶，仅占